

数字时代劳动异化下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量

李 晨

宝鸡文理学院 陕西宝鸡 721000

摘 要：数字劳动作为新型劳动形态在数字时代应用很广泛，它在推动劳动者自由解放方面有一定超越性，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劳动领域的背景状况下，平台经济呈现“灵活自由”外在表现，可实际上它借助算法管理重新构建了劳动控制机制，让劳动者陷入新型异化困境里，加剧劳动者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丧失，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破除数字异化，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核心命题，为数字时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理论回应。

关键词：数字时代；劳动异化；马克思主义人学；平台经济

一、数字异化的四重重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劳动异化的四个维度：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在数字时代，这四种异化不仅未被消解，反而以新的形式深化^[1]。

（一）劳动产品的异化：从实物到数据

异化源自拉丁文，最初有疏远、脱离、转让之意，具体是指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1]。传统的异化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下，工人生产的商品归资本家所有，工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例如纺织工人不能将自己织出的布匹私自拥有。马克思曾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在当代的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产品的异化有了新的特点，它是一种无形的剥削，劳动者不能直观看到数据的运行。对于平台劳动人员来说，劳动产品不仅是服务这些基本的送外卖、接客这么简单，更是网络数据的比拼，如平台会将外卖小哥的配送产品的数据进行优化算法，从而对他们进行控制，又如进行骑手训练、交通预测等手段，压缩外卖人员的配送时间。各个平台的智能派单系统根据历史数据压榨送餐人员潜能，这样一来骑手每天的订单就会增加，但随之而来事故发生的次数也相应提高。数据异化的本质仍然是劳动者创造的数据被资本占有，并反过来成为剥削工具。

（二）劳动过程的异化：算法规训取代工厂纪律

在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劳动过程的异化主要体现在工人丧失对于生产过程的掌握，他们的劳动被分解为简单的可重复的动作，并且无法决定生产的流程，只能执行上级命令，他们的劳动沦为了“被迫的劳动”。

数字时代对于工人的剥削则更加的精细化了。平台根据数据和算法再次更新了劳动的控制模式，形成了“数字泰勒主义”。对于外卖骑手来说他们不仅需要控制外卖送餐的时间，在相应的时间内完成订单，这样一来便在时间上对于骑手进行了控制，而且骑手必须在系统推荐的路线内送餐，按照导航行驶，不然会触发警告被扣分，从而实现空间控制上面的数字化。除此之外，平台还对他们进行行为服务的管理控制，外卖小哥被要求标准的话术向顾客问好，收到差评的骑手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还有滴滴司机必须保持微笑，AI技术如果检测到司机的叹气评率过高这些消极情绪的话可能会被扣分，算法还通过“隐形降权”来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劳动者进行惩罚，把他们接到的订单分配到远距离低价格，形成了算法PUA，对劳动者进行心理操控。平台还利用“游戏化”掩盖剥削本质，比如“钻石司机”“王者骑手”等头衔使得劳动者获得虚假的成就感，实际则是加剧同行竞争，进行进一步剥削。因此，在非物质化生产过程中，数字劳动者与数字劳动过程相异化^[4]。

平台通过时间精准控制、空间数字化分割、行为算法督导、游戏化激励四重机制，实现了比工厂体制更隐蔽且高效的劳动剥削。

（三）类本质的异化：碎片化劳动消解人的创造性

马克思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提出，人的“类本质”是在于人有自由自觉地开展创造性劳动的能力，这同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所在，在理想情形下，劳动不只是用以谋生的手段，是人实现自我的途径，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致使劳动出现异化，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相互分离，劳动变成了被迫的、外在的

生活动。在数字时代，这种异化持续存在，并且以新的形式加剧，体现为零工经济的去技能化以及算法管理之下的劳动碎片化。

在平台经济范畴中数字劳动呈现出高度标准化与简单化的状况，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了系统性的抑制，以外卖骑手为例，其工作被分解为从接单到取餐再到送餐的机械循环模式，算法预先规划好了最优路线，骑手只需按照导航指令执行，无需做出任何有创造性的决策。

工业时代的异化劳动体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直接强制，数字时代的异化则更具备迷惑性特征，劳动者形式上拥有自由像自主接单那样，实际上却被算法和评分系统塑造的行为模式所支配，一位自由职业者在访谈里的陈述极具代表性意义，即“我能在任何时间工作但结果是我所有时间都在工作”。

（四）人与人的异化：评分系统制造的虚假共同体

在传统的工业社会当中，劳动异化呈现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直接对立的状态，然而数字平台凭借技术架构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重构，把阶级矛盾转移成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平台经济依靠评分系统以及即时评价等相关机制，赋予了消费者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权力，让劳资矛盾在服务体验的话语里被掩盖起来，例如外卖骑手要是收到一个差评，有可能会被扣除当日收入的20%，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把不满发泄到用户身上而非针对平台，在2023年北京有一位骑手，因为连续收到差评竟在顾客门前下跪求情，这一案例充分展现出这种异化的极端情形，另外平台借助黄金骑士、钻石司机等游戏化标签，构建起虚假的荣誉体系，使得劳动者群体出现分化，阶级认同也随之发生瓦解。

算法黑箱的存在让剥削关系变得越来越隐蔽，劳动者根本不清楚扣分规则的具体算法是什么，只能不断依靠自我规训去适应系统所提出的要求，这种新型异化加剧了个体劳动者孤立无援的状况，还消解了传统工人阶级进行集体抗争的可能性，成为数字时代资本控制劳动的一种全新形态。

二、数字时代人的解放路径的探索

（一）技术批判的深化

技术决定论将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归因于技术本身，认为数字时代的剥削必定随着算法、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而出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探索数字异化根源是资本逻辑对技术的驯化^[5]。

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数字技术成为资本增值的精细

技术，以平台经济为例，外卖平台的“智能调度算法”不只是为了提高配送效率，而是利用实时数据计算骑手的生理极限，例如美团专利申请中就将“骑手疲劳忍耐阈值”设置为算法参数以使劳动强度最大化。

技术决定论的本质是资本掩盖剥削的意识形态策略。平台企业宣传“算法中立”和“技术赋能”以逃避对自身使用数据监控、奖惩机制来控制劳动者的指控，一些研究反而将算法压迫归结为“技术不完善”，提出“更人性化的AI设计”，掩盖了资本对技术的根本支配作用，掩盖了阶级斗争，将剥削问题技术化，消解了劳动者的反抗意识。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是透过技术背后的生产关系，并超越资本逻辑的异化可能，历史唯物主义同样认为技术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制度，同样的算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用来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加剧剥削，劳动者的反抗实践如骑手集体拒单、数据造假，也证明技术并非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而是可被挑战的社会建构。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分析劳动者如何夺回技术的控制权，如利用算法民主化、数据合作社等替代性经济形式真正实现数字时代的劳动解放。

（二）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案

数字劳动的异化问题不能仅靠技术改良解决，而必须通过制度变革重构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制度层面遏制资本对数字技术的滥用，并为劳动者的解放创造结构性条件。

（1）数据确权：打破平台的数据垄断

当下平台借助算法无偿获取劳动者的行为数据，像配送轨迹、接单习惯等，并把这些数据转变为提升剥削效率的工具，欧盟的数字服务法率先给予用户“算法解释权”，规定平台要公开自动化决策的逻辑，劳动者可就不合理的算法调度进行申诉，中国杭州试点推行的“算法取中”政策强制外卖平台设定接单上限以及强制休息间隔，实际上是把马克思所讲的“工作日斗争”拓展到了数字领域。未来立法需要明确劳动者对个人数据拥有所有权，比如创建“劳动数据账户”，准许骑手决定是否向平台共享数据，或者要求平台为数据使用支付报酬。

（2）算法民主化：劳动者参与技术治理

算法黑箱是数字异化的重要机制，德国“共同决策制”的数字化运用表明，劳动者代表参与算法设计可以有效约束资本的单方面控制，正如当年柏林外卖平台骑手发起罢工争取“恶劣天气自动延长配送时间”的算法

条款一样,英国“零工经济劳动者联盟”发起立法承认平台劳动者集体谈判权来挑战资本主导的规则制定模式,都证明了算法的民主化治理是可能的,而建立的制度化的劳动者参与渠道是关键。

(3) 公共数据池:超越私有化的替代方案

平台经济存在的根本矛盾是数据私有化问题,日本“农业数据协作平台”给出一种替代解决思路,农户通过集体管理耕作数据来避免被垄断企业低价收购,与之类似可建立“数字劳动公共数据库”,由工会或者非营利机构管理劳动者配送接单等数据,这些数据用于优化公共政策比如城市规划而非资本增值,这种模式既能够保障数据安全又能削弱平台的数据霸权,还可为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奠定基础。

以上这些方案并非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而是已经在全球局部实践当中得到验证的可行路径,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怎样把这些分散的抵抗措施进行制度化,从而形成系统性的替代方案,最终达成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在数字时代的重生。

(三) 人学重建的教育维度

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不仅表现为经济对劳动剥削,更深层的是对人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摧毁。马克思人学理论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人的生存困境问题是我们应当关注的焦点^[2],但是在数字经济中被资本逻辑所支配,劳动者沦为数据的算法。重建人学向度,就是要在技术结构中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寻求劳动解放的现实道路。重建人的主体性,要从经济保障、教育赋权和共同体重建三个维度加以突破。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主体可能性,如果劳动者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接受高强度数字劳动,就根本谈不上“自由劳动”,芬兰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证明了经济安全可以减少对平台的依赖,让劳动者有底气拒绝不合理的算法调度,中国部分城市试点的“网约车司机最低小时工资”也证明制度干预可以制约资本无限压低劳动价值,更激进的做法则是劳动者集体控制技术工具,如德国外卖平台由骑手民主管理算法确保为劳动者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增值服务。

其次教育是解构数字异化现象的核心支点,平台经济剥削的秘密化如数据提取与心理操纵,需要劳动主体掌握技能的同时了解自身各项权利,法国的“数字扫

盲券”可借鉴应用于平台劳动者,培训内容不能仅限于APP技能,要融入数据权利与算法逻辑,深圳工会“算法识读课程”的实践表明可策略性抵制理解系统规则达成的骑手可以迫使平台提高订单单价,“认知解放”呼应保罗弗莱雷所批判的教育知识,揭露技术如何被资本逻辑驯化。

最后要强调的是真实共同体能够重构社会性,平台通过“积分榜”“骑士节”营造虚假共同体,实际上是在瓦解劳动者之间的团结,西班牙的“骑手合作社”已经证明,当劳动者集体拥有平台的时候,算法能从控制工具转变为服务媒介,线下互助网络像“骑手驿站”这类,能够提供法律和心理方面的支持,以此对抗平台的原子化规训,这些实践其实指向马克思所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要在技术社会当中重建人的社会本质。

数字时代的劳动解放并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制度创新、教育革命与集体行动的辩证统一,当劳动者掌握经济自主权、技术认知力和组织力量时,异化的铁笼最终会被打破。

结论

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作为技术赋权假象下的新型剥削,算法管理通过数据控制、时间压缩与情感规训重构马克思的经典异化理论,未来研究应重点揭露生成式AI对劳动内容的颠覆,积极探索人机协作下人的主体性重建的可行路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数字时代依然具有批判力,但需要结合技术哲学与劳动政治学来进行拓展化,以实现“自由劳动”的终极目标构想。

参考文献

- [1]张秀丽,李雨思.平台化生存:以人为本的考察[J].青年记者,2024,(05):95-99.
- [2]周德红,林雯雯.数字劳动异化视域下人的生存困境问题的批判与反思[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7(02):55-60.
- [3]王圆圆,刘彬彬.智能时代的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消解[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3,37(05):43-52.
- [4]张伟艳,杨莲秀.马克思异化劳动视域下数字劳动异化及治理分析[J].现代交际,2022,(05).
- [5]马晓媚.批判与超越: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研究[D].浙江大学,2021.